

# 白崇禧傳 (三)

(本文插圖刊30、31、32頁)

## 肅清直魯聯軍殘部

民國十七年六月，奉軍退出關外，張作霖被炸死。六月八日，第三集團軍的商震部進入北京，六月十一日，白崇禧與閻錫山同車抵達北京。七月初，蔣中正總司令會合到北京的各集團軍高級將領、中央委員等一百餘人，在香港碧雲寺向國父孫中山先生靈前行告祭禮，並決定和平解決東北問題。但當時直魯軍張宗昌、褚玉璞尚有殘部五、六萬人，盤據天津以東開平、唐山、豐潤一帶，失去奉軍的奧援，不能退往關外，戰又戰不過革命軍，又不投誠，竟於七月下旬，勾引山東煙臺方面的已投誠部隊叛變，企圖製造機會，從海道入山東，捲土重來的大幹一場。於是蔣總司令乃下令各集團軍抽調若干部隊，予以清剿，而以白崇禧為總指揮，以李品仙指揮左翼軍，在玉田附近集中；徐源泉指揮中央軍，在蘆臺、楊家泊一帶集中；范熙績指揮右翼軍，在寶坻附近集中。當時，張學良猶圖說服張宗昌、褚玉璞下野，部隊接受中央改編，請求白崇禧暫緩行動。可是，張宗昌、褚玉璞不聽勸告，仍要繼續抵抗，而且等待山東煙臺的事態發展。於是，白崇禧

乃於九月二日下令開始攻擊。左路軍由玉田直指豐潤，轉向唐山、開平，攻擊敵的側後；右翼及中央軍沿北寧鐵路兩側攻擊唐山、開平，然後向灤河西岸的樂亭追擊。各路軍進展神速，直魯軍雖然拚命苦鬥，但仍被擊敗，失去豐潤、唐山、開平、樂亭各地；而於九月十四日退往灤河東岸，並將河上鐵橋炸毀。此時，奉軍也在榆關以西的遷安、盧龍、昌黎一帶佈防，阻止直魯軍再向東竄，並且電請中央軍暫勿渡過灤河，以免發生誤會，自願負責解除直魯軍武裝獻給中央。

另一方面，直魯軍也派代表找李品仙，認為奉軍不夠朋友，要與奉軍決戰以洩憤，不論勝負，戰後即遵命繳械，全體歸降。也要求不要渡過灤河。李品仙將以上情形報告白崇禧，白崇禧授權給李品仙酌情處理。奉軍和直魯軍果然在灤河東岸發生激烈戰鬥，相持數日，直魯軍雖敵奉軍的猛烈砲火，只好放棄抵抗，一部被奉軍繳械，大部退回河西，向中央投誠，共三萬人，槍械兩萬餘枝，大砲卅門。

白崇禧處理此事非常慎重，惟恐稍有差失，四處逃散，禍害地方。於是指示部屬一面分發給養安排休息，並對各級官員加以撫慰。然後按部

費雲文 執筆  
王成聖、黃啓武 校訂

隊分成若干隊，每隊以一系列火車載運，相距一小時，依次向西開行；同時指定不同終點站，分派不同部隊負責繳械。如此分地分時隔離處理，結果非常順利，完滿達成解除武裝分別資遣的工作。

東北方面，張學良派總參議楊宇霆為代表，到灤州會晤白崇禧，願意歸順中央，白崇禧乃代表蔣總司令，雙方簽字同意，張學良遂於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通電全國，表示決不妨礙統一；十二月廿八日再聯合東北重要人士通電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四省易用青天白日旗幟，歸順中央，全國遂告統一。

## 兩湖事件辭職返桂

北伐時期，由於戰事關係，發展為各成系統的四個大集團軍，各擁數十萬大軍，據有廣大地區。另外兩廣為革命的大後方，東北、西南仍操持在地方軍人之手，茲略加分析如下：

中央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部隊分佈於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，政令、軍令最為統一。

開封政治分會：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兼分會主席，轄區為：河南、山東、陝西、甘肅、

青海、寧夏等省，兵源最多，發展最快，馮玉祥把中央補助的軍餉用於擴充，而不發給官兵，以致官兵所得比中央差。

太原政治分會：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兼分會主席，轄山西、察哈爾、綏遠等省。對平、津地區也有影響力。

武漢政治分會：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兼分會主席，轄湖北、湖南兩省，餉源不足，賴中央補助。白崇禧則以前敵總指揮率部在天津以東一帶（四個集團軍都有部隊）。

廣州政治分會：北伐軍總參謀長兼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，任分會主席，轄廣東、廣西省。

東北邊防軍：司令長官張學良，轄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四省，另成一局。

其他：雲南龍雲，貴州王家烈、周西成，四川劉湘、劉文輝、楊森等，各有小部隊。

以上各分會地區，名義上屬於中央，而行政、財政均自行直接支配。中央當然希望改變此一有統一之名而無其實的軍政情況。

財政方面，當時全年的國庫收入只有五億元，而軍隊有一百五十萬以上，除了支付軍費，所餘不多，談不上國防建設、經濟建設。況且國家既已統一，也不需要如此龐大而素質不齊的軍隊，所以必須加以整編精簡，中央於是於民國十八年元月召開「編遣會議」，召集各集團軍總司令及東北代表，黨政要人如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李宗仁、何應欽、李濟、朱培德、鹿鍾麟、商震、白崇禧（未參加）、吳敬恆、張人傑、蔡元培、胡漢民、李石曾、譚延闓、戴傳賢、王寵惠、

宋子文、孫科、趙戴文、王伯羣、張羣、王樹常（代表張學良）、陳季良（代表楊樹莊）等人與會，由蔣中正主席主持會議。

「編遣會議」的原則，是保留精壯五十萬，充實裝備，練成國防軍，裁去一百萬，將節省約二分之一的軍費，充作國防建設、經濟建設之用，預定分六個編遣區，實施編遣：第一到第四區，專管編遣原隸屬於第一到第四集團軍的部隊，第五區編遣東北各軍，第六區編遣川、康、滇、黔等地方部隊。中央此一舉措，實係天經地義的當務之急。但掌握重兵的各方，對此都沒有建立共識和互信，總以為這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藉口，實際的目的是「削藩」。

白崇禧對此，有他的看法和主張。他以為裁兵不難，裁將難，各集團軍的將領能夠起來，都是有歷史的，一旦要裁掉他們，問題很多。所以他主張「實邊政策」：第一集團軍控制中央及北平、武漢、廣州、西安各要點，其他二集團軍往西北（陝、甘、寧、新疆），三集團軍向內外蒙（察、綏、蒙古），四集團軍向西南（由川、滇支援向西藏）分別發展，東北軍整理東北；化兵為工農，投入生產建設。如此，一百五十萬人並不為多。如果有些官兵聽說要到邊疆，自動不去，那等於淘汰。中央所努力的是裝備統一、訓練統一、軍令統一。他把這個建議，轉請李濟探出席時提出。

開會時，由蔣中正主席，大會對外宣言，以「不偏私、不假借、不中輟」昭告國人。蔣主席並在報告中對日本明治維新史中的長、薩、土、

肥四雄藩的自處之道，詳加闡釋，希望國家從此擺脫軍閥割據的陳跡。

可是，馮玉祥、閻錫山事先看到整個裁軍案早就不滿。等到蔣主席報告後，馮玉祥就發言，以為：第一、中央直屬部隊保留太多，其他集團軍裁得多。第二、待遇不公平，中央軍待遇好（這一點只怪他自己把中央補助的軍費拿去擴軍，沒有分發給每一官兵）。馮、閻二人即提出與中央針鋒相對的意見，沒有得到結果，當時馮是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，閻是內政部長，都指派火車在浦口，先後搭專車離京，以出走的行動來杯葛「編遣會議」，白崇禧的建議也就無從提出討論了。（註一）

馮玉祥、閻錫山一走，「編遣會議」無疾而終。但李宗仁為了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留在南京。白崇禧則仍在北平，但不到兩個月，武漢出了問題。

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是效忠中央的，每月按期以該省稅款匯繳南京，並且也直接向中央領軍餉、軍械補給，李宗仁以為湖南是「武漢政治分會」的勢力範圍，稅款應該繳給「分會」。魯滌平不聽。於是二月十九日「武漢政治分會」的委員會（出席張知本、夏威、胡宗鐸、陶鈞）即決議免去魯滌平的省主席職務，並且派第七軍赴長沙，逼走魯滌平，攻擊魯滌平的部隊。

這當然是件大錯特錯的舉動，因為自北伐成功後，中央迭有明令：「政治分會並沒有任免該區特任官員的權力，所屬軍隊，非經『編遣委員會』的命令，不得擅自調動。」因此中央派蔡元

培、何應欽、李濟琛前往漢口徹查，一面下令雙方軍隊各駐原地，不得自由行動。

李濟琛也是廣西人，與李宗仁關係密切，有人稱他們為「桂系」，便避重就輕，藉口李宗仁事前並不知情，不予處分；但將「政治分會」的幾個委員免職了事。

李宗仁此時在上海治療胃病，於三月四日以「武漢政治分會」主席名義，發表談話，聲明擁護蔣主席，促進統一。可是在軍事方面，不但沒有下令約束他的部隊遵照中央命令，撤退侵入長沙之師，駐守原防，反而部署其部隊為五路，以何鍵、葉琪、夏威、胡宗鐸、陶鈞等為司令，積極備戰，擴大變亂，進兵江西，並且和汪精衛勾結，通電反對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。

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開會議決裁撤各地「政治分會」，命葉琪、夏威等部退回原防。李濟琛將會談情況通知李宗仁部軍人（李宗仁、白崇禧未參加大會），不但不接受中央命令，反而四處向中央軍挑釁，政府不得已，乃先扣留李濟琛，撤免葉琪、夏威軍職，決定用兵，明令討伐。白崇禧得知中央決定對武漢用兵，乃致電蔣中正主席，略謂：「武漢政治分會的處置不對，胡、陶、夏操切無理，罪有應得，應當如何處分，我完全負責，但千萬不可動兵。」但他並未能憑他的力量，約束武漢的部隊聽從中央命令。

當時傳說白崇禧也在北方有響應武漢行動的圖謀（此事尚屬疑問，因在北方受白指揮的第四集團軍軍隊，桂省僅有韋雲淞一個師，其餘李品仙等均為唐生智的舊部，似不可能聽命反叛中央，也

不能發生任何作用），而且中央明令討伐的電文中，也提到他的名字。於是他不自安，乃於三月十六日離開天津，經過日本前往上海，並且發出致蔣主席的辭職電文云：

「……職因身體未能復原，曾邀准給假休養，所有職務，早交由李師長品仙接代，至第四編遣區主任與三三大會代表，因病驅待診，實難分身，素荷鈞座愛護之深，必能曲賜矜全，俾乘此時機，以安心靜養，身體稍健，即來京面領訓辭。」

中央討伐之師，由蔣中正主席親任總司令，何應欽為參謀長，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，第一軍劉峙部和第三軍朱培德分兩路沿江西征，四月一日督師，由於師出有名，士氣旺盛，連克武穴、廣濟、羅田、蕪春、黃岡、麻城等地。叛軍第三路副司令李明瑞在黃陂、孝感反正；何鍵也通電擁護中央，於是叛軍全線崩潰，大部投誠。蔣主席於四月五日進駐漢口。曾被指為禍首的胡宗鐸、陶鈞兩軍，部隊投降，胡、陶二人通電下野出洋。廣東方面，自李濟琛被中央扣留撤職後，由陳濟棠接任第八路軍總指揮，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。站穩擁護中央的立場。

李宗仁、白崇禧回到廣西，已經調出去的勁旅，都已經失去了。省內的祇有黃紹竑的第十五軍（約三師十二團），與汪精衛、馮玉祥都有聯繫，搞「護黨救國軍」活動，在湘、粵軍的壓迫下，又發生呂煥炎政變的事情；於是李、白、黃（紹竑）三人都被迫離開廣西，寄居越南海防。中央派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，率部入桂

，但受共黨利用，竟於民國十八年底，運動「反蔣」。留在省內忠於李、白的梁朝磯副師長乘機聯合呂煥炎「反俞」。俞外受中央的壓力，內受梁、呂的反對，不能支持，只好一走了之。於是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紹竑又被歡迎回到廣西，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，從事「模範省」的建設。

### 建設廣西配合剿共

當時的廣西，社會秩序很差，除了南寧、桂林、梧州、柳州四大城市的人民，可以安居樂業外，其餘各縣，大多盜匪橫行，民不聊生。

白崇禧等回到廣西，安定以後，首先是肅清盜匪，安定社會秩序；接着就是澄清吏治，銳意建設，從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四方面齊頭並進，其最後目標為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廣西，而揭倡的政策為：

#### (一) 三自政策：

自治：編組鄉、村、鎮、街、甲的地方基層組織、訓練地方行政幹部。

自衛：每鄉編組民團，利用農閒操練軍事，派軍校畢業尉級軍官下鄉督練。縣長為中校軍官，副縣長為少校軍官。

自給：儘量減少進口外國貨，自己發展水泥、製糖、火柴、硫酸、製械等工業、礦業，拓展外銷。

#### (二) 三寓政策：

寓兵於農：以農民為主要兵源。

寓將於學：由普通中學及大學中選拔優秀，進入軍官學校深造，培訓將才。



寓募於徵：改募兵制為徵兵制，學生在校要受軍事訓練，畢業時還有集訓。

實施的步驟，首先建立基層組織，藉以推動基層建設。

要有效而確切的建立基層組織，必須徹底改變當時仍然為部落和封建勢力所支配的社會形態。於是他們的作法是首先建立鄉、村、甲的制度，暫時利用部落和封建的勢力以為過渡，一面創設「民團幹部學校」，遴選各縣青年，施以軍事以及其他應有的學識，嚴格訓練，再用這些幹部分任鄉長、副鄉長、村長、副村長等職；用當地的青年，推動當地的鄉政，發生逐漸打破舊勢力、舊習慣、舊意識的作用。

另外成立「民團總指揮部」，以白崇禧兼任總指揮；增設學校，開啓民智，規定凡是受過訓練的鄉長，都兼任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民團後備大隊長的職務。村長則兼任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民團後備隊長；所謂軍、政、學「三位一體」。由此而推動生產、建設。

領導階層也講究黨、政、軍三位一體，從民國廿年起，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的常務委員、省政府主席、第四集團軍的首要將領，每月開談話會一次，溝通意見，消除隔閡。凡事關全省的重大措施，先在此審慎的討論，獲致決議，再由主管機關發令實施，後來改談話會為黨、政、軍聯席會議。首要人物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（黃紹竑因故離開廣西）之間相互尊重信任，從無猜嫌。

由於上下一體的從基本上着力，積極埋頭建

設，所以不但省政府的政令，能够切實貫徹實施，而且各方面突飛猛進，廣西人民都能安居樂業，生活也有改進，社會形象煥然一新，到了抗戰前夕，成為全國聞名的「模範省」。這在原來是地瘠民貧、形勢混亂的情況下，沒有外力援助，全靠自力所創造的佳果，是相當難能可貴的。

（註二）

雖說是李、白、黃三位一體共同努力，實際上一切政策，都是白崇禧一手擬訂，並且能督導不懈，貫徹到底，他還有禮賢下士，求才若渴的長處，比如他尊敬馬君武，超過軍人對文士的禮遇。此外，他還能善用客卿，比較知名的，如黃季陸、邱昌渭、潘宜之等，都對廣西的建設，有相當貢獻。

此外，軍人方面，羅致贛籍劉士毅、皖籍張義純、浙籍俞星樑、冀籍劉任、粵籍區壽年、林偉成（空軍）等，在省內從事建軍工作。又以鄂籍胡宗鐸於民國十八年曾在鄂省襄陽、樊城將第十八、十九軍完整交還中央，功過相抵，仍羅致南來，力薦出任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。至於贛籍張定璠，曾隨白崇禧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，進兵滬濱後，白崇禧力薦授黃郛出任上海市長，婉請沈怡（黃郛妻弟）留任工務局長，白崇禧屢次召見沈怡，勉以協力建設上海為一有名國際港口。白崇禧仍邀請張定璠南來，亦力薦出任西南政務委員。李宗仁則任該會常務委員，經常駐居廣州市，廣西省內黨、政、軍事宜，全由白崇禧負責推動辦理。（註三）

白崇禧在忙於治理廣西的時候，對中央刺滅

中共的軍事，却也能遵照中央命令作密切的配合。民國廿一年，受命任國軍剿匪第五路副總指揮（總指揮陳濟棠），由陳濟棠派第一軍余漢謀部，白崇禧派第四十四師王贊斌（在臺逝世）部入贛參加剿共，王部作戰於安遠、信豐、虔南、安南、龍南一帶。當民國廿三年，共軍在江西不能生存，傾巢逃亡，經過廣西邊境向貴州流竄時，白崇禧毫不猶豫的徵調桂北各縣的約十二團民團，於預料共軍必經之地的全縣、灌陽、興安、龍騰沿途擇要埋伏。全縣的守備，由民團指揮官陳恩元負責，龍虎關的守備，由民團指揮官蔣如荃負責，各率民團四團防守。另調黃鎮國、韋雲淞兩個師，於興安、灌陽一帶作機動使用。他自己則親往桂林坐鎮指揮。自十一月廿一日起發生激戰，他陸續調動兩個師增援，大戰三日，終於將共軍首尾切成數段，並包圍其一部於文市、鹹水，俘虜七千餘人，繳槍三千枝。此外，並發動民衆、民團，厲行空室清野，共軍經過六七十公里的正面，找不到糧食，餓死不少。共軍以無法在廣西停留，只好匆匆由龍勝、三江地區向貴州逃竄。（註四）

參與長期抗戰策略

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，中央已決定抗戰。八月二日，蔣委員長電召白崇禧入京共商戰爭大計。當時廣西將領對中央仍有疑慮，李宗仁、李品仙、夏威、廖磊、黃旭初等都反對白崇禧入京，惟恐中央對他不利的，他以爲：「抗日是兩廣素來的主張，也是國民一致的要求，如今，抗日時機

成熟，正是吾人報効國家的時候。如果不應召赴京，不但辜負蔣公的德意；而且過去所揭倡的抗日口號，也就成爲自欺欺人，必將爲國民所唾棄。」遂即力排衆議，毅然入京。

蔣委員長特派水陸兩用座機，飛到南寧迎接白崇禧，四日成行。隨帶潘宜之、黃季陸（黃從此在中央任職）等人同行。當晚，蔣委員長即在陸軍官校召見餐敘，對他相當親切禮重，消息傳出，羣情鼓舞，都以爲這是國內團結禦侮的先聲，日本報紙報導此事，竟冠以大標題爲：「戰神到了南京，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！」

不久，中央發表白崇禧爲副參謀總長（何應欽爲總長），後來並兼任軍訓部長。

中央爲全面抗戰，在南京召開全國軍事會議。因爲白崇禧已經來了，於是馮玉祥、閻錫山、劉湘等也都來參加。劉湘甚至在會上慷慨陳詞，願出兵五十萬。

白崇禧入京後，最主要的任務，就是參與擬訂「抗日戰爭我方的作戰計劃」，和「大本營對日軍作戰的指導原則」，因而有第一期消耗戰、第二期持久戰、第三期反攻戰的規則。

八一三淞滬戰起，白崇禧奉令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到前線觀察戰況，中途被敵機轟炸掃射，險遭不測。既到前線，發現司令長官馮玉祥遠在宜興山洞中，並未實際指揮，一切戰區責任，由副長官顧祝同擔負。他忖度是否因爲第三戰區都是中央和西南的部隊，馮怕指揮不靈，所以不到戰區。他回京後與何應欽商議。他以爲西北部隊如宋哲元、石友三、石敬亭、孫連仲、劉汝明、馮

治安等都有愛國熱忱，也都是馮的舊部，他們對受程潛指揮，不大如意。不如在黃河以北、山東北部、河北等地，開闢一個新戰區——第六戰區，由馮玉祥負責，連同韓復榘的兵力，總計有十五萬人以上，可以有番作爲。同時對第一和第三戰區也有好處。何應欽很同意白崇禧的看法，乃由他二人向蔣委員長建議，也蒙採納。

可是，命令發表，韓復榘首先反對，馮玉祥就職後，宋哲元、石友三等對馮玉祥畏懼而不信任，加以馮玉祥害怕敵機，每日更換指揮所二三次，往往與各軍失去聯繫，所以宋哲元、石友三等也密電中央反對。蔣委員長覺得如此發展，影響很大，乃召見白崇禧，要他致電請馮玉祥回京，轉達其部屬反對之情，請馮自動辭職，調充軍委會副委員長。並將第六戰區撤銷，部隊分隸其他戰區。上海棄守後，蔣委員長召開高級軍事會議，討論防守南京事宜。白崇禧以爲能够參加南京保衛戰的部隊，多係甫由淞滬戰場撤下，傷亡太大；而沿途撤退，上有敵機，後有追兵，士氣低落，無能爲力；不如宣佈南京爲不設防的城市，將主力退到城的西南一帶，另在浦口集結重兵，監視南京，掩護徐州；保留實力，以便機動打擊敵人。可是，會議開始，蔣委員長即宣布要防守南京，唐生智也自告奮勇，願任指揮之職。白崇禧恐擾亂最高統帥的決心，所以未將建議提出。事後他很不安，他以爲雖然委員長已有決定，也應提出自己的意見，以供參考，才算盡到做部屬的責任。

臺兒莊大戰之先，蔣委員長曾到徐州觀察，

白崇禧隨行。事後，蔣委員長令白崇禧留下，組織參謀團，協助李宗仁指揮軍事。

三月廿四日起，日軍進犯臺兒莊，我軍奮勇抵抗，戰事相當激烈。白崇禧經常到戰地觀察，與各軍各師的高級將領聯絡。一面代表蔣委員長面致慰問，一面了解戰場實況，克復困難，曾經爲了壓制敵軍的炮火，向武漢大本營申請重砲兵；爲了克制敵軍的戰車，向第一戰區程潛洽調戰防砲兵，對鼓舞士氣，克敵制勝，有相當關係。

民國廿七年七月，中央準備武漢會戰，以第五戰區在長江北岸作戰，第九戰區在長江南岸作戰。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因爲牙疾必須到武漢動手術，所以中央命白崇禧代理司令官。七月十七日，他赴商城就職，十九日擬定確保長江北岸要旨。八月七日他在浦水召集各將領開會，並即頒發作戰命令，大概區分如下：

作戰區分左、中、右三個軍團。

右翼軍團由李品仙指揮，轄三一軍（韋雲淞）、七軍（張淦）、八四軍（覃連芳）、八六軍（何紀重）、二六軍（蕭之楚）、八七軍（劉膺古）、五五軍（曹福林）；以大別山南麓爲根據地，對長江北岸挺進的敵軍逐次側擊，預期消滅於右翼港灣錯雜的地區。

中央區由廖磊指揮，轄第七軍（張淦）、八四軍（張義純安徽人，援軍連芳職）、十軍（徐源泉）、豫、皖邊區的游擊隊和皖省的地方團隊，並由廖任皖省政府主席。固守大別山東麓各要隘，阻敵深入，建立長期抗戰的根據地。

左翼兵團由孫連仲指揮，轄三〇軍（池峯城

、四二軍(馮安邦)、五一軍(于學忠)、五九軍(張自忠)、六八軍(劉汝明)、七一軍(宋希濂)、七七軍(馮治安)，逐漸誘敵西進，並結集兵力於葉家集、河口鎮以東地區擊破敵人。另戰區自轄部隊有劉膺古軍(欠一師)及一八三師，控制於涪水、宋埠附近。

他所指揮的各軍，多係自徐州會戰突圍轉進的部隊，為數不多，補充未畢，訓練未精，即令參加大戰，番號雖多，但實力不如敵軍強勁。

時當秋天，長江一帶陰雨霏霏，沿江地區濕氣尤重。久戰疲乏的部隊，體力衰弱，容易感染疾病。尤以鄂東的惡性瘧疾為甚，凡被感染者，體溫忽寒忽熱，輕則不能行動，重則不支身死，加上軍中醫藥缺乏，雖有奎寧丸也不能大量供應，所以患者往往數月不能痊癒，對戰力損耗之大，較與敵戰死傷為尤甚。

白崇禧本人自會戰開始後的第三個月，也感染此疾，體溫超過四十度，雖服用奎寧丸仍無效果。蔣委員長在漢口知此情況，特派參謀次長熊斌偕醫師到涪水探視，服用特效藥阿斯匹林，才日漸痊癒。

在以上所述不利的條件下，他仍能鼓舞部隊的精神戰力，善操指揮技巧，在嚴守遲滯消耗敵人的策略下，造成若干勝利，如右翼軍李品仙部於潛山、太湖、黃梅一帶，曾截斷敵軍歸路，迫使攻佔廣濟的敵軍退却，遲滯敵軍進攻武漢的行動，左翼的宋希濂軍也以富芝山為據點，攻守並用，傷亡敵軍五、六千人之多，得到局部的勝利。十二月，敵軍已推向鄂省的應山，中央以武

漢保衛戰已歷時五月，大小戰役數十，死傷敵軍五萬人以上，擊沉敵艦過百，毀敵機百餘架，已達消耗目的，乃於十五日下令放棄武漢。適李宗仁已病癒歸來，白崇禧乃解除代理司令長官職務，重回中央供職。

長期抗戰必須有穩固的政治軍事中心，維繫全國軍心、民心，所以武漢放棄後，必須健全重慶外圍，中央決在桂林增設軍事委員會長桂林行營，指揮第三、四、九等三個戰區的軍事，任命白崇禧為行營主任，仍兼軍訓部長、副參謀總長。

### 崑崙血戰痛殲頑敵

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中旬，敵以第五師團與臺灣旅團由海、空軍的掩護，在我廣東的欽州灣龍門港登陸。以錐形突擊戰術，突破我軍海岸防線，然後分兩路：一沿欽欽公路，一取道小董、百濟，進迫營江南岸，直指南寧。我軍防廣兵單，裝備落後，被敵攻佔南寧，及南寧外圍的險地崑崙關、高峯隘等處。

我桂林行營以收復南寧為目的，令第四戰區於崑崙關、高峯隘以北地區佔領陣地，牽制當面之敵，等待援軍到達，再行反攻。

中央為阻止敵軍再行深入，並實施反攻，特調集第二、五、六、九九、三三六等軍，組成卅八集團軍，由徐庭瑤任總司令，開赴前方，並命組織桂林行營指揮所於遷江，由主任白崇禧親自坐鎮指揮。

我軍反攻的重點和首一目標為崑崙關，這是一個易守難攻的要隘。敵軍以第五師團的一個旅

團擔任該方面的防守，在崑崙關前方的高地要隘，都築有據點式的堡壘，周圍都有幾重鐵絲網，配附機械化部隊與砲兵，形成極為強固的防線。

我軍進攻崑崙關的主力，為當時惟一有機械化配備的精銳第五軍，以鄭洞國的榮譽第一師擔任正面攻擊，邱清泉的新廿二師繞出敵後五塘、六塘，截斷敵軍往南寧的交通後路，戴安瀾的二百師，由東面繞過崑崙關，夾擊敵軍。另組成兩個支隊，一為團長熊笑三支隊(含一個團和一個加強營)，一為二百師副師長彭壁生的支隊(由兩個新兵補充團組成)，由左翼迂迴側截八塘、九塘。另外還配屬第九十二師進出四塘，阻敵增援，用以圍殲崑崙關附近之敵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攻擊開始，邱清泉的新廿二師進入敵後，激戰三日，連克五塘、六塘；預測敵軍必來反撲，乃在敵可能進軍的路途上，利用地形，布置埋伏。

十九日下午，敵軍果以大車隊急馳而來，邱清泉乃以小部隊誘敵深入。等到次日凌晨一時，突然下令全師出擊，在信號彈和照明彈的呼應照明之下，以猛烈砲火，向敵軍集中轟擊，敵軍陷入重圍，進退維谷，車輛多中彈爆炸，紛紛化整為零向南山潰逃。損失卡車二百輛，裝甲車八輛，死傷一千餘人。

敵軍後退公路被我截斷，乃改鑽小路，並利用空投，向崑崙關增援。

我正面進攻的榮一師與二百師，血戰數日，因為敵軍憑有利地形頑強抵抗和空軍的擾亂，死傷頗重，邱清泉再以戰勝威武，請求參加正面攻



擊。

十二月廿五日，我攻擊部隊正奮勇力戰，白崇禧親臨砲兵陣地觀察指揮，見到敵軍利用反斜面陣地及副防禦，我軍衝鋒十次以上未能奏功。他巡視地形，見敵陣地左側有高山，可做為砲兵側射敵陣地之用，遂下令砲兵指揮官邵百昌，將卜式山砲一連、俄式戰防砲數門，搬到敵陣地左側的老毛嶺、枯桃林、標高一五五高地，側射敵的反斜面陣地，並壓制敵機槍、山砲，毀其鐵絲網，支援我軍衝鋒攻擊，一舉成功，攻佔足以瞰制崑崙關的重要高地。

卅日拂曉起，新廿二師和一五九師加入衝鋒戰鬥，經過兩天的力戰，終於勇克崑崙關。

此役，敵軍第五師團所屬第十二、廿一兩聯隊及一個砲兵大隊，幾乎全部被我軍殲滅。第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、廿一聯隊長杉木古之助、四十二聯隊長坂田元一皆被我擊斃，其餘班長以上官佐，死亡達百分之八十五，士兵戰死七千餘人。敵對我軍作戰的英勇，非常敬佩，曾於撤退前，在九塘張貼佈告云：

「……在此地帶之上，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，值得我軍表示敬意……今壁選九塘於蔣軍，最後我所拜祭九塘附近數萬死傷之日華兩軍，贊其武勳，並祈冥福」。

敵軍遭此挫敗，南寧危急，乃由廣東方面抽調近衛師團與第十八師團的一個旅團，海運欽州登陸，增援南寧，結合原有兵力共達三個師團，編為第廿二軍，於民國廿九年一月廿五日再反攻崑崙關，我軍雖然奮勇抵抗，奈因裝備較劣（第

五軍因犧牲較大已撤到全縣整補），未能有效阻止敵軍前進，迄二月二日，崑崙關、賓陽、上林、武鳴均告失守。

可是，敵軍不但停止再進，却又撤調十八師團回廣州，僅保持南寧、欽縣、防城各要地及其外圍，作長期防守之計。

我軍則在邕江兩岸部署襲敵擾敵之師。敵軍為解除左側所受威脅，乃在邕南沿邕龍公路攻佔綏淶、明江、龍州。

民國廿九年十月，德國發動歐戰，法國戰敗，日軍第五師團前往越南，南寧一帶只有近衛師團與臺灣旅團，兵力較弱。我軍乃下令各路軍發動攻勢。以十六集團軍夏威部進攻明江、龍州之敵，十月廿六日克復，再掃蕩邕欽路東段殘敵，並協攻南寧。令卅五集團軍龍光部猛攻南寧。

並分兵渡過邕江，截斷邕欽路，協同第十六集團軍攻邕欽路北段之敵。卅日，我卅五集團軍克復南寧。各部繼續追擊，敵軍沿邕欽路，以海空掩護，於十一月十七日由海道乘船撤退。

敵軍未能長期佔領南寧，而不得不撤退；除了戰略上無必要外，廣西地方上民衆不予合作的反抗力量，也有關係。

自抗戰以來，敵騎所到省份，當地士紳間有為敵所利用組織偽組織，附和敵人的，或者受共軍威脅，另有組織的。惟有廣西，當敵軍佔領南寧時，民衆除老弱由教堂、醫院負責收容外，其他人等皆走避一空。邕欽、邕武兩路沿途二、三十華里內的民衆，也是如此，不但無人，而且也沒有物（空空清野），壯丁則納入民團，或與軍隊

一致破壞道路橋梁，阻敵交通，或擾亂敵人，皆不願做順民受敵利用。於是不斷阻截交通，使敵軍補給困難，現地又無物可買，更加深其久居的困難因素，迫使其不得不早作歸計。此其間，過去民國廿年以還，白崇禧在廣西從事的基本建設，有其因果關係。

崑崙關戰役期間，白崇禧先設行營指揮所於紅水河北岸遷江附近的石岩內。攻崑崙關時，將指揮所推進到賓陽的白岩村。石岩內滴水，濕氣很大；因為指揮部隊，防敵空襲，指揮所設在山洞之內。等到會戰完畢，他發作風濕病，夜不能寐，手不能握拳，非常痛苦，經過打針電療，才漸告痊癒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一：白崇禧本職為總司令部副參謀總長，李濟深為參謀總長，因此白崇禧「編遣意見書」乃交由出席會議的李濟深轉達。惜李在蔣總司令表示編遣方針後，竟不敢提出編遣意見書。否則，日後當不致造成多次內戰。

註二：民國二十四年胡適之博士訪問廣西，八月十二日發表「南遊雜憶」，闡揚廣西：①武化精神。②治安良好。③儉樸風氣。④廢除迷信。

註三：白崇禧逝世時，沈怡任交通部長，親輓一聯：「草木識威名狀荷旌忠畢世功勳銘竹簡。鼓鑿思將帥史應垂範千秋偉業報旂檀。」可見他們兩人相知之深。

註四：白崇禧曾令電影隊長黃學禮（粵籍，留法習藝，現居香港）攝成「共匪七千俘虜」影片，到處放映，激勵軍心民氣。